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华佛教史



总主编
季羡林
汤一介

西藏佛教史卷

王尧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014007372

B949.2
49
V7

中华佛教史

西藏佛教史卷

王 尧 著



总主编

季羡林

汤一介



北航

C1694211

B949.2
49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佛教史·西藏佛教史卷 / 王尧著.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3.7
(中华佛教史 / 季羡林, 汤一介主编)
ISBN 978-7-5440-5936-7

I . ①中… II . ①王… III . ①喇嘛宗—佛教史—中国
IV .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9398号

书名 / 中华佛教史 · 西藏佛教史卷
作者 / 王尧

出版人：荆作栋
总体设计：崔元和
编辑主持：雷俊林 刘立平 杨文
责任编辑：樊爱香 彭琼梅
复审：郭志强
终审：刘立平
装帧设计：薛菲 李珍
印装监制：郭勋 贾永胜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山西教育出版社
(地址：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0351-4729801 邮编：030002)
印装：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1.5
字数：365千字
印数：1—5000册
书号：ISBN 978-7-5440-5936-7
定价：63.00元

《中华佛教史》总序

◎季羡林

此丛书名曰《中华佛教史》，为什么我们不按老规矩，称此书为《中国佛教史》呢？用意其实简单明了，就是想纠正一个偏颇。我们惯于说中国什么史，实际往往就是汉族什么史。现在改用“中华”这个词，意思是不止汉族一家之言，而是全国许多个有佛教信仰的民族大家之言。

谈到中华佛教史，我们必须首先提到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书取材丰富，分析细致，确是扛鼎之作，已成为不朽的名著。但是，人类社会总是在不停地前进，学术也是日新月异，与时俱进。到了今天，古代西域（今新疆一带）考古发掘随时有新的考古材料出土，比如，吐火罗语就是在新疆发现的，过去任何书上都没有这种语言的记载。所以我们感觉到，现在有必要再写一部书。

在中国古代佛教的著述中，有几种实际上带有佛教史的性质，比如《佛祖历代通载》等。佛教以及其他学科而冠以史之名称（如文学史之类），是晚近才出现的，其中恐怕有一些外来的影响。

近代以来，颇有几种佛教史的著作，这些书为时代所限，各有短长，我在这里不一一加以评论。

我们现在有胆量写这一套中华佛教史，就是为了赶上学术前进的步伐。

总而言之，归纳起来我们这套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我们不只说汉族的事情，也介绍我国其他有关的少数民族的情况；第二，我们对古代西域佛教史的发展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第三，现在写这部书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两千多年的

演变，最终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佛教仍然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中国人民不管信佛教与不信佛教的，都必须了解佛教的真相，这会大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了解。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中外互相了解，全世界都互相了解。

我是不信任任何宗教的，但是，对世界上所有的堂堂正正的宗教，我都有真挚的敬意。因为这些宗教，不管它的教义是什么，也不管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些宗教总是教人们做好事，不做恶事，它们在道德上都有一些好的作用。因此，现代世界上，宗教的存在有它的必要性。专就佛教与中国而论，佛教的原生地印度和尼泊尔，现在佛教已经几乎绝迹，但在我门中国，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原因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大度包容。中华民族文化之所以达到今天这样如火如荼的程度，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这种特点。从当前世界来看，我们最近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概念，这就希望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互相了解，互相促进，共同达到人类社会更高的层次。

所以，我们研究佛教写佛教史，不但有其学术意义，还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华佛教史》

总主编

季羡林

汤一介

《隋唐五代佛教史卷》 洪修平

《宋元明清佛教史卷》 魏道儒

《近代佛教史卷》 麻天祥

《佛教文学卷》 孙昌武

《佛教美术卷》 金维诺

《西藏佛教史卷》 王 尧

《云南上部座佛教史卷》 张公瑾 杨民康 戴红亮

《中韩佛教交流史卷》 魏常海

《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卷》 杨曾文

《佛教史论集》 季羡林



目 录

第一章 佛教传入前的“吐蕃”	1
第一节 藏族原始信仰——民间崇拜	2
第二节 藏区原始宗教——苯教信仰	16
第二章 佛教传入吐蕃的艰难历程	29
第一节 佛教初传吐蕃	29
第二节 佛苯斗争与吐蕃佛教的初步建立	34
第三节 佛苯争崇与汉印佛教争雄	45
第三章 前弘期佛教——吐蕃佛教的发展与衰落	54
第一节 从松赞干布到赤松德赞	55
第二节 赤松德赞之后藏传佛教的兴起	61
第三节 朗达玛灭佛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	70
第四章 漫长的民间佛教时期	74
第一节 民间佛教背景与“下路弘法”	74
第二节 阿底峡大师与“上路弘法”	77
第三节 藏传佛教的家族式传承	81

第四节	藏传佛教的民间师徒传承	85
第五章	藏传佛教部派的形成和发展	90
第一节	藏传佛教之噶当派	90
第二节	藏传佛教之宁玛派	108
第三节	藏传佛教之噶举派	127
第四节	藏传佛教之萨迦派	158
第五节	藏传佛教之格鲁派	172
第六章	藏传佛教的几个特点	198
第一节	藏传佛教之活佛转世制度	198
第二节	藏文《大藏经》的形成过程与内容	223
第三节	藏传佛教之经院教育与学阶制度	243
第七章	藏传佛教的社会化和本土化	267
第一节	佛教初传吐蕃时的本土化过程	267
第二节	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创造——活佛转世	272
第三节	藏传佛教社会化的标志——僧才的产生与发展	278
第四节	藏传佛教社会化的根基——藏文经典的集成与发展	281
第五节	藏传佛教社会化的文学艺术表现	287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东传与藏汉文化交流	289
第一节	藏传佛教东传的内涵、方式和范围	289
第二节	藏传佛教东传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交流的特点	291
第三节	藏传佛教传入西夏	294
第四节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297
第五节	藏传佛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播	302
第六节	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	306
第七节	小结——对藏传佛教东传的评价	312

第九章 藏传佛教与藏区现代化及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314
第一节 与社会相适应是宗教历史发展的前提与必然结果	315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	318
第三节 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	320
第四节 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条件和基础	322
第五节 藏传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324
第六节 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初步表现与 应当注意的问题	326
参考文献	331
《中华佛教史》后记/汤一介	335

第一章

佛教传入前的吐蕃

我们知道，宗教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自然原因，一是社会原因。所谓自然原因，就是在人类对自然界缺乏科学认识的情况下，对严酷、多变的自然现象产生敬畏的心理，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由某一个万能的神在主宰，于是原始的崇拜诞生了，并逐渐演变成某种宗教。对此恩格斯早就说过：“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① 正是风、雨、雷、电等“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自然现象让人类祖先望而生畏，产生某种信仰或崇拜。这是对导致宗教产生的自然原因的经典诠释。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为了利用人们业已存在的宗教心理或信仰，巩固自身的地位，就以某种社会主宰的身份对宗教进行有利于本阶级利益的诠释和弘扬，而贫苦的劳动人民则寄希望于神圣的护佑，今世苦难不会在来世重现，于是推动了宗教信仰的发展，这是宗教信仰发生发展的社会原因。

当然，在佛教传入藏区以前，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原始

^①《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672页。转引自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信仰，那就是原始自然崇拜信仰和藏区原始宗教信仰——苯教。本章分两节讨论佛教传入吐蕃前的民间崇拜和苯教信仰。

第一节 藏族原始信仰——民间崇拜

古老的藏族有着内容十分丰富的原始信仰崇拜。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近现代藏族民俗中窥视原始信仰崇拜的遗风；另一方面，藏族原始信仰的许多内容被后起的苯教乃至本土化的佛教所吸收，已经融入苯教、佛教中去了。因此，藏族苯教、佛教中的一些内容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源头同样可以一直找到原始崇拜中去。

在纷繁复杂的藏族民间崇拜中，既有各民族共同信奉的灵魂崇拜等对象，也有它特殊的崇拜物，如牦牛、箭等。就大范围而言，可分为动物崇拜、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等几大类。

一、动物崇拜

藏族崇拜的动物对象主要有猕猴、雄狮、牦牛、羊等，另外还有犬、鸟（鹏）等。

1. 猕猴崇拜

一提起藏族的猕猴崇拜，我们立刻会想起藏族的民间传说和诸多史籍中猕猴演变为人的故事。藏人公认自己是猕猴和罗刹女的后代，西藏山南地区泽当贡保山至今留有猕猴洞，“泽当”的意思就是猴子玩耍坝，系猕猴向人转变时下种青稞的第一块土地。这则以猕猴为中心，涉及藏族族源的传说，受到历代藏族僧俗官民的广泛喜爱，因而也出现在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等处的壁画上。而对此传说记载尤详的是《王统世系明鉴》（1388年成书）。

圣观世音菩萨，对一神变示现之猕猴，授给近事戒律，派遣到西藏雪国的地方修行。这个猕猴到一个黑色山岩上修行，当他修习菩提慈悲之心，对于甚深之佛法性空生起圣解的时候，有一个被业力所驱使的岩妖魔女来到那里，用爱慕求欢的话语挑逗，后来魔女又穿上妇人的服装，对猕猴说：“我们俩结成夫妇吧！”猕猴回答说：“我是圣观世音菩萨的居士，如果当了你的丈夫，就会破了我的戒行。”魔女说：“你不当我的丈夫，我的命就完了。”

魔女这样苦苦哀求，以至流下眼泪。猕猴想到：“要是当了她的丈夫，就破了戒行，不当她的丈夫，又有大罪孽，应该怎么办？”猕猴立即到普陀山圣观世音菩萨的面前，向观世音菩萨求教……菩萨回答说：“那你就当岩妖魔女的丈夫吧！”

猕猴与魔女结为眷属以后，生下了六个猴崽……这六个猴崽被其父猕猴送到叫做鸟集林的水果丰盛的地方。过了三年，父猕猴前去观看，只见猴崽们已增加到五百个，这时树上的果实已经吃完……

观世音菩萨说道：“你的子孙后代，由我来抚养。”于是观世音菩萨起身，从须弥山的缝隙中取来青稞、小麦、豆子、荞麦、大麦芽，撒到大地上，使那里长满不种自生的谷物，交给他们，并吩咐说：“吃吧！”由于这个原因，该地后来被称为梭当巩波山（即前文所谓“泽当贡保山”）……^①

我们抛开后期佛教徒的再加工不谈，“猕猴变人”的传说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藏族早期神话传说。

关于猕猴是不是藏族的图腾崇拜，这在学术界仍是有争议的话题。在我看来，藏族有猕猴崇拜是真，但还没有上升到图腾崇拜的地步。理由有四：其一，一般来说，被一个民族奉为图腾的动植物，首先应是与该民族早期的物质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植物。用这条原则考察“猕猴变人”的神话，就会发现这则神话具有明确的地域性。它产生在雅鲁藏布江两岸的农业谷地。“猕猴变人”传说中的各种内容证明它只能是一个农耕、林居部落的传说，绝不可能是游牧部族的族源传说，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绝不会把生活在农林交界地区的猕猴作为自己的图腾。其二，猴祖神话在汉藏语系的18个民族中流传，流传面非常广泛。其三，倘若猕猴是藏族的图腾，一般是备施崇敬，不加伤害的，而它却出现在祭祀场合：《新唐书·吐蕃传》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尽管图腾还可分食用型图腾、非食用型图腾两种，食用型图腾在举行一定仪式后便可宰杀，但我们仍不能确定猕猴是藏族的图腾。假如猕猴真是藏族的食用型图腾，以此推之，羊和犬也都应该是藏族的图腾了。这样的推理显然是缺乏史实依据的。其四，据噶玛额列所著《常用星算宝瓶》载，藏族著名的五大氏族都有其灵魂所寄托的动物：董氏

^① 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王统世系明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3页。

属土，灵魂托于鹿；祝氏属水，灵魂托于牦牛；扎氏属金，灵魂托于野驴；廓氏属火，灵魂托于山羊；噶氏属木，灵魂托于绵羊。唯独没有猴子。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确认猕猴是藏族的图腾崇拜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2. 雄狮崇拜

藏人对狮子的崇拜十分久远且经久不衰，见于史籍的是吐蕃的军旗上绘有狮子，足见狮子当时在藏人心中的地位。我们在西藏安多地区了解到，过去一些部落械斗中也使用狮子旗帜。藏族所谓狮，大多前加一“雪”字，称“雪狮”（gangs-seng），在绘画中的形象通体洁白，着有绿鬃。有人认为雪狮并非狮子，是指雪豹，实际不然。稍有阅历的人们都知道，过去整个藏区所绘制的狮子确为狮形，而非豹形。尤其是1931年至1953年西藏发行的几十种有狮子图案的货币均用狮形。比如1931年印制的纸币章噶：十章噶，正面图案为日光普照下卧一雄狮；十五章噶，正面图案为日照群山，上有行云，下有流水，一雄狮头顶一装满供物的宝盘；二十五章噶，正面图案为日光普照的群山下，一大一小二狮相戏，等等。这些具体的图案中，从未用雪豹来代替狮子的形象，可知狮子形象和雪豹形象并未混同使用过。

至于说狮子不曾生活于藏区，是夸张、加工的产物，同样难以立论。首先，狮子与所谓龙、凤有所不同，龙、凤形象现实中不存在，是汉民族不断加工而成的，整体上我们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动物；狮子则有所不同，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动物物种，不需要任何加工。其次，关于狮子，藏人古老的传说中早已有之，据说很久以前，雪域西藏有很多动物，由于经受不住冰雪严寒的袭击，纷纷迁徙，连大象也迁到温暖的南方去了，只有雄狮经受住了寒冷的考验，仍然在雪域生活、繁衍。据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研究，在距今3000~5000年，中国的气候属于温和气候时代，当时的青海地区和新疆南部属亚热带气候。显然，与青海和新疆南部毗连的西藏地区的气候至少与之相同，甚至还要高，同样具备狮类生存的条件。^①从新石器文化中可知，这一时期也是藏族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藏人由牧业社会逐步进入农业社会。由于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语言能力和思维水平的提高，此时的藏族原始先民的物质及精神文明处于一个高峰期，原始崇拜已成系统。因此，倘若此时有雄狮崇拜，即便以后随着寒冷气候的逐步进逼，狮类远走他乡，狮子的形象仍会以动物崇拜的形式流传下来。否则，我们对有关的远古传说就无法理解了。

^①竺可桢等：《物候学》（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藏人对于雄狮，有极为广泛的崇敬心理，在脍炙人口的《格萨尔王传》中表现得最为充分。格萨尔的另一个尊号便是“雄狮大王”，因为雄狮这一形象代表着勤劳、勇敢、威严、勇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是藏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它是绝望中的希望、孱弱者的力量，是气节，是冲锋，是牺牲，是奋发向上的正气。“像雄狮那样活着”，正是广大藏族人民的信念和座右铭，也是老一代对青年人最好的教导和期盼。格萨尔被冠以“雄狮大王”之美誉，正反映了这一英雄形象身上所凝聚的藏民族精神中近乎完美的刚正不阿、勇猛顽强的高贵品格。

3. 牦牛崇拜

在如今的藏区，牦牛崇拜还是十分普遍的。如位于长江流域的四川甘孜、阿坝藏区，西藏的昌都地区等地都把牦牛头骨、牛角作为灵物供奉，把牦牛尸体等当做镇魔驱邪的法物，嘉绒藏区甚至要专门过祭牦牛神的年，其虔诚可见一斑。

有学者曾撰文说：

在嘉绒地区，对牦牛的崇拜亦是多方面的，他们在石墙上面嵌上白石牦牛头，虔诚礼拜之。嘉绒藏人还要过独特的祭牦牛神的年，名叫“额尔冬绒”，时间在藏历的11月13日，乃是传说中嘉绒先祖“额尔冬爷爷”的生日。“额尔冬爷爷”在传说中的事迹，与《格萨尔王传》很相似，由于他神通广大，能上天、入地、下水战胜各种妖魔，嘉绒人才得以安处。而“额尔冬爷爷”的原身（法像）即为牛首人身，所以每逢过嘉绒年时，土司、土官、守备、大头人家都要用面做一个2尺多高的牛首人身像，供于家中神主位上虔诚奉之。^①

另外，四川西南部的冕宁藏区每隔十三年要在藏历的正月里举行为期三天的“祭牛王会”，由此可见这一古老信仰的生命力。

牦牛崇拜，我们依然可以在有关史籍中找到蛛丝马迹。藏族历史传说中，说当初天神之子聂赤赞普乃自天而降；《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叙述赞普王统时，直截了当地说天神之子“遂来作吐蕃六牦牛部之主宰”^②。在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冈底斯山神、亚拉香波山神多次化身为白牦牛。在《王统世系明鉴》中，有关止贡赞普之子如拉杰的出生经过就是如此，非常神奇动人：

大臣罗昂篡夺了国政，让止贡赞普的王妃去放马。王妃前去牧马时，在睡

^① 邓廷良：《嘉绒族源初探》，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②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梦中梦见与亚拉香波山神化身的一个白色人交合，醒来的时候，看见一头白牦牛从枕边起身而去，此后过了八个月，王妃生下了一个血肉团，有拳头那么大，还会蠕动。因为是自己的血肉，不忍抛弃；想要养育，它又没有嘴巴眼睛。于是把它放到一个温热的野牛角里，用衣袖包裹起来，过了几天前去观看，里面长出一个男孩，给他取名为绛格布如拉杰。^①

汉文史籍也有一记载，藏族人种源于牦牛羌系一部落，即以牦牛冠之，则以牦牛为图腾。从西藏旧石器文明、细石器文明、新石器文明可知，西藏高原在3万~5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居住，大约在5000年前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显然，汉籍所载在秦厉公（前476—前443）时曾为秦国俘虏，后在青海等地开疆拓土、发展势力的无弋爱剑和在南凉（397—414）“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的秃发樊尼，经过青藏高原的兼并战争，才使居住在甘、青、川等地部分原为藏人的部落再回到藏民族之中。所谓羌人风习，实际为藏人风习；所谓羌人崇拜，实际为藏人崇拜。藏人崇拜牦牛与羌人崇拜牦牛，两者并无二致。

藏族的牦牛崇拜中有些地方值得我们注意，比如把牦牛崇拜与自然崇拜中的山神崇拜结合在一起。亚拉香波、冈底斯、念青唐古拉、阿尼玛卿、年保贡则等青藏高原上的著名山神，它们的化身都是白牦牛。^②

在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牦牛崇拜之痕迹无处不在。甘、青部分藏区还流传着“什巴答义”（创世歌），说什巴宰牦牛时，将牛头放在高处，就有了山峰；牛皮铺脚下，就有了大地；牛尾放山阴，就有了森林，等等。牦牛是青藏高原的特产，成为藏人崇拜的图腾也仿佛顺理成章。但是，在这些牦牛图腾的出现中，更引人注意的不是牦牛本身，而是其色泽：白色。藏人尚白，而尚白的国度或地区除藏族地区外，还有印度、波斯等。藏族有关白牦牛的传说，很可能受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传说佛祖入胎时，就有一头白象进入其母亲的梦中，而后生下佛祖。^③ 随着佛教的广为传播，佛祖形象的日益完美高大，白色更为神圣、崇高。接受了佛教文化的藏人，是否会借这个故事来圣化白色，而以藏区特有的牦牛替换了大象呢？或者说，藏人本从远古就有白色崇拜，而自从接受了佛教文化之后，色彩

^①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王统世系明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6页。

^②参阅后文“自然崇拜”。

^③王小明译注：《佛传——释迦生平故事》，学苑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6页。

崇拜上的偶同更加深了藏人的尚白观念呢？藏区有白牦牛，而大多是黑牦牛，而牦牛在一些故事中又成了恶魔的象征。比如关于朗达玛（藏族历史上的灭佛赞普）的传说，就说他是牦牛的转世，但好像没有说到白色。可见牦牛本身并不神圣，真正神圣的是白色。

4. 瓶崇拜

瓶瓶就是瓶羊，是一种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大角野羊。据《辞海》所载，瓶瓶为大角牡羊，本身可作运输工具，其肉可食、皮可衣、毛可编织，与藏族先民的生活、生产劳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①因此把它当做神灵来崇拜，是很自然的事。在汉文史籍中就有关于藏族先民信仰瓶瓶的记载，不过极其简略。《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其俗，重鬼右巫，事瓶瓶为大神”^②。《旧唐书·吐蕃传》则只有“多事瓶瓶之神”^③寥寥几字。由此可见藏族奉瓶瓶为神的年代同样十分悠久。《水经注·河水》载：梁晖之祖父被羌人推为“梁帅”，梁晖“将移居枹罕，出顿此山，为群羌围迫；无水，晖以所执榆鞭竖地，以青羊祭山神，泉出，榆木成林”。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古代有羌人以青羊祭山神的传说。

羊确实是羌族先民的崇拜物。早期羌人的活动地带，三危山、积石山、玉山一带，当地土著供祀的神就有羊的某些特征——“状皆羊身人面”（《山海经·西山经》）。马长寿先生在其遗著《氐与羌》中写道：“今四川羌民……唯以两角羊象征羊神供于壁上。又端公（羌民巫师）所戴羊皮帽有两角，亦由羊皮做成。”这是近代的事，与古书记载不谋而合。

瓶瓶崇拜在近现代的藏族民俗中仍有一些反映。在过藏历年时，除了“切玛”^④外，还要摆一个羊头，这羊头一般用酥油等物塑成，饰以彩绘，或青面黑角，或白面黑角，伴之以黄色羊眼，形象逼真有神，额中央塑有日、月、星、焰火等吉祥物。“切玛”、羊头等现有两层含义，一是祝贺去年的丰收，一是预示来年的农牧有好收成。羊头饰物，在有些地方也渐渐为陶器和泥塑所代替，这样就不需要

^①参阅《辞海》第84页、第2103页。

^②《新唐书·吐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072页。也可参见中华书局二十四史16开缩印本卷十二，第1550页上。

^③《旧唐书·吐蕃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220页。也可参见中华书局二十四史16开缩印本卷十一，第1332页下。

^④一种长方形五谷头，上插青稞或麦穗、彩花板等饰物。

年年更换。这种风俗可能是从原始社会祭祀形式演变而来的，人类对其崇拜的心理不言而喻。

此外，藏人动物崇拜尚有犬、鸟（鹏）等。这里不再详述。

二、自然崇拜

身处青藏高原的藏族先民比其他民族更能感受到自然与人休戚与共的关系，因此对自然的崇拜更为虔诚，崇拜的对象也更广泛。

1. 山崇拜和山神（年神）

藏族可以说是一个与山为伍的民族，只要您举目四望，眼里肯定都是大大小小的山和山影，难怪有人说山崇拜是构成藏族原始信仰体系的基础。在藏族人看来，山神数不胜数，大山有大山神，小山有小山神，并且各有其势力范围；而年神则是一种在山岭沟谷中游荡，在石缝、森林中安家的神。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亚拉香波山便是一尊年神：

前年早于去年，冈底斯雪山脚下，
麋鹿野马在游荡，游荡到亚拉香波山前。
如今再来观赏，在亚拉香波“年神”眼前，
麋鹿、野马如果狂妄，冈底斯雪会把你吞没。^①

不难看出，年神在藏族先民心中的崇高位置。另外，我们也可以发现年神和山神的血肉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年神、山神、土主是混淆的。

藏区最著名的山神（年神）有四个：

(1) 亚拉香波，位于东方。亚拉香波的具体居住地在雅鲁藏布江河谷的亚拉香波山上。这尊山神的形状是一头大白牦牛，后被莲花生收服。一般情况下，它的特征是两手各执一水晶神剑和带小旗的短矛。

(2) 库拉卡日，位于南方。库拉卡日的具体居住地也在如今的西藏山南地区。其形象是一个着头盔和水晶铠甲、穿白衣的男性，右手持短矛，左手执一狼之头骨。

(3) 诺吉康拉，位于西方。诺吉康拉的具体居住地在今西藏的江孜附近，体呈绿色，持剑和黑旗。

^①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